

展成為在大陸有一定影響力和權威，設施比較先進，教學功能和培訓內容比較齊全的英語培訓機構。

成露茜教授給我的印象是開朗健談、直來直去，從不繞圈子。她在幫助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建立英語培訓中心的時候，也非常直爽的指出大陸的培訓在方法和理念上的不足。她辦事的眼光非常長遠，同時也有耐心，一件事一次談不仔細就多次談，從不灰心，從不放棄。

中國大躍進期間「調查研究」的實踐與挑戰

追憶成老師露茜的風範與志業

熊秉純*

引言——成老師露茜的風範與志業

成老師過世的消息來得太突然。去年(二〇〇九)暑假王振寰學長到多倫多開會，好多年沒有見面，有機會見面，特別感到親切。敘舊中，問起Lucie的情況，王學長說，Lucie的病症已經控制，所以近來跟同學的聯絡多了許多。我表示教師節會給老師打電話，希望給老師帶來個驚喜。教師節在我自己開學後的一陣混亂中悄悄溜走。再聽到Lucie的消息就是一月二十七日，由不同朋友同學傳來老師過世的消息。記得那天外面下著大雪，我正在準備第二天要教的課，得到了老

* 本文資料收集部分的經費來自加拿大人文社會研究基金會(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編輯夏曉騰提供經費，支援寫作過程的文字處理。多倫多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生趙怡對相關資料的收集、整理，以及文字處理，貢獻良多。陳美禮、林孝信、陸鴻基、潘乃容、王振寰、吳一攪、張衛國、趙怡對初稿提出許多寶貴意見，在此一併致謝。在最後修改時，我把與本文直接有關的意見納入，對於跟我正在進行的「實性研究在中國社會學的發展與挑戰」研究項目雖然有啟發，但跟本文不直接有關的意見，暫時擱置。整體說來，此文是我正在進行「實性研究在中國社會學的發展與挑戰」研究項目的一部分，因為對資料的分析和掌握仍不成熟、不周全，錯誤難免，敬請讀者批評指正。來信請寄電子信箱 pchsiung@uisc.utoronto.ca.



二〇一一年作者(右)與陝西婦女與家庭理論研究會創辦人高小賢(左)合影于西安。在一九九三年作者與高小賢因參加由成老師主辦的北美華裔社會學者學會的第一次年會而結識，之後展開長年的合作。

師過世的消息之後，多倫多的冬天好像一下子變得特別的嚴寒難耐。同學朋友之間藉著電腦信件，互相安慰取暖，拉到眼前的是一幕幕的回憶。

當年我進了UCLA社會學研究所後，也跟著大夥稱她為Lucie。在北美的學界，學生對老師「沒大沒小」直呼其名不足為奇，但是因為自己和老师都來自臺灣，不僅同是華人，而且也受過導師重道傳統的薰陶，不稱老師為老師，而直呼Lucie其名，剛開始很不習慣，久而久之，稱老師為Lucie，慢慢有了特別的意義。多年來，跟隨著“Lucie”而來的，不只是老師那親切的聲調和獨特甜美的笑容，還有一份說不上來、獨一無二、與老師之間亦師亦友的情份。但是自從得到老師過世的消息後，取代那種「沒大沒小」的隨意和「放肆」，是一份揮之不去的

懷念和悵然若失的尊重。「成老師露茜」成了我在老師過世之後，跟別人談起老師獨特經歷、風範和志業的稱號。

老師過世之後，曠鴉負起籌畫出版紀念集的重任。她跟我交換了一點意見，因為我正在做一個質性研究(Qualitative Approach)在中國實踐與發展的課題，我提議針對這個課題中我所看到的材料，對「大躍進時期(1958-1962)【調查研究】的實踐與挑戰」做一個初步的梳理。¹很感激曠鴉的支持，讓我能時間很緊迫的情況下，完成任務。

我從社會學研究質性研究的方法論和認識論的視角，針對毛澤東所大力宣導的「調查研究」在大躍進時期的實踐和所面臨的挑戰，提出並回答以下幾個問題：

「調查研究」到底是怎麼進行的？

「調查研究」的具體目的是什麼？

「調查研究」由誰完成的？

「調查研究」的報告是怎麼寫的？

「調查研究」跟當時的國家建構有什麼關係？

我根據「昌黎調查」和「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的兩個案例，從具體事例來回答這幾個問題。但從宏觀的角度來說，這些問題所共同觸動的議題，都牽涉到：社會學的「學」與「用」的問題、知識份子與國家的關

1 本文以「質性研究」、「定性研究」的兩個名詞，說明兩個不同的傳統。前者指的是西方以田野調查、深入訪談等研究方法為主的傳統；後者指的是以毛澤東一九二〇年代農村調查這個傳統所衍生的研究方法。我認為以兩個名詞區分這兩個傳統非常有必要，首先是因為「質性研究」和「定性研究」兩個名詞，兩岸三地在用法上有區別，臺灣用「質性研究」，香港用「質的研究」，指的都是西方的傳統。在中國，西方這個傳統於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剛傳入時，用的是「定性研究」。後來，在教育學領域，為了與馬列主義學者所指的「定性研究」有區分，才改用「質的研究」一詞，但是在社會學領域，確仍然以「定性研究」一詞，攪括兩個傳統非常不同的傳統。我認為從名詞上區分這兩個傳統，不僅有助於厘清這兩個傳統在方法論和認識論上區別，更跟當前「質的研究」在中國的實踐與推展有關，也跟「質性研究」在臺灣和香港的本土化的很多議題相關。

係的問題、以及知識生產(production of knowledge)與國家建構(state-making)之間的關係。因此,以這篇文章,追念老師的經歷、風範、和志業有兩層意義。

第一,在一九八〇年代中國社會學重建之後,身為一個在美國大學任教的華裔社會學者,老師扮演了參與和促進的角色,如眾所皆知的:老師到中山大學社會學系講課、北美華裔社會學者學會(North American Chinese Sociologist Association)在老師和其他幾位華裔社會學者的共同努力下慢慢形成氣候,²老師在那段時間籌備並主持諸多中美學術交流會議、促成學者交流專案的安排。老師過世之後,我跟不認識老師的年輕學者提起老師時,總是說,老師在社會學領域所開拓的是一個志業而不是一個職業。這個「志業」的理念,也呈現在老師後來在臺灣辦學、辦報的視野和魄力上。更重要的是,從老師的參與和努力中,我們看到的不僅是老師個人對「學」、「用」的理念和實踐,而且凸顯著老師對「批判視角」的執著和追求。

第二,一九八三年老師與蘇耀昌學長在美國社會學學會刊物《社會學評論》(*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上共同發表了一篇名為《社會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重建:論馬列主義社會學的本土化》(The Reestablishment of Sociology in the PRC: Toward the Sinification of Marxian Sociology)的論文。這篇論文探討的主題是社會學在中國的大學於一九五二年被關閉之後,社會學學者為了要求重建社會學,分別於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七九年開展的兩次論戰。從微觀視角而言,本文要回答的具體問題是,為什麼社會學學者在一九五七的論戰中失敗,以致不能說服當時的當政者,重新設立社會學,使得社會學要等到一九七九年論戰成功之後才能重建。從宏觀的視角看來,這篇論文探討

2 這個學會成立之初,舉辦過幾次主要的學術交流會議,多年來,每年固定在美國社會學會年會前一天開會,是一個華人社會學者交流的平臺。

的核心問題是社會學的「學」與「用」的問題,是五四運動以來一再討論的,知識分子與國家興亡之間關係的問題,也是知識生產與國家建設之間應有什麼樣的關係的問題。這從文章的結語裡,所提出的以下幾個關鍵問題特別看得出來:中國社會學能不能對現有或未來將會出現的社會問題提出有效的解答?如果不能,怎麼辦?如果它所提的答案不為當權者所認同,那會怎麼樣?社會學會不會成為中國政府推動現代化改革政策失敗的代罪羔羊?就長遠來看,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Marxist Sociology)會是一個如馬克思和毛澤東所期許的,改造人類命運的學科,或是僅僅是統治者維護其權勢的工具(Cheng and So 1983)。

從這兩層意義上看,我這篇探討「大躍進時期(1958-1962)【調查研究】的實踐與挑戰」的文章,有寫得太遲了的惋惜。雖然,我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以後,參與了實性研究在中國社會學科推廣的工作(Hsiung 1999),我也在社會學研究上,針對以質性研究方法,研究社會性別(gender perspectives)在中國的相關議題發表過文章(熊秉純 2001),但是我開始比較有系統地探討質性研究方法以及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還是過去一兩年的事,因此,我從沒有機會跟老師討論過相關的議題,如今更不可能得惠于老師對這篇文章裡所探討議題的評論,也不會有機會聽聽老師對社會學在中國過去三十年發展的看法,因此,在這篇遲來的文章的背後,有我個人的遺憾。然而,因為我對社會學在中國近代史的發展的理解和當今社會學研究方法教與學的探討,仍然在起步階段,還有很多資料還在查找,也還有很多相關的議題沒有理清,思緒更不成熟,因此這篇文章其實是提早問世。寫作過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因此,我特別感謝聽講的支持,以及學長、同事的鼓勵,讓我有勇氣以「野人獻曝」的方式,追念老師的風範和志業。

以下我首先從社會學于二十世紀初由西方傳入中國的歷史脈絡做

一個概括的敘述，然後針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發展和毛澤東所提倡的「調查研究」做比較詳細的說明，在敘述這個歷史的大背景之後，我提出為什麼需要從方法論和認識論的角度，以「調查研究」為切入點，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深入研究。在此前提底下，我以〈昌黎調查〉和〈兩校人民公社調查〉兩個案例，探討大躍進時期「調查研究」的實踐與挑戰。

社會學傳入中國的歷史脈絡

對中國而言，社會學是一門外來的學科，它的傳入，跟十九世紀中期以來，西學東漸的大潮流有關。嚴復把Herbert Spencer的The Study of Sociology於一九〇三年翻譯成中文，譯名為《群學肆言》，梁啟超和譚嗣同也分別在他們的寫作中提到「群學」或「社會學」的概念，這是西方社會學知識傳入中國之始(Wong 1979；閻明 2004)。在此之後，社會學慢慢在大學裡變成一門課程，起先是由美國的傳教士或是在美國大學得到過社會學學士或碩士學位的美國講師，在當時剛成立的教會大學(如上海的聖約翰大學和上海浸禮會學院及神學院)開始授課，開設的課程雖然是以社會學為名，後來也包括社會調查的課，更帶著學生以問卷的方式，做了一些社會調查，來描繪中國文化和市井小民的生活，也記錄了當時社會變遷的脈絡。但是這一時期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主要是西方傳教士所推動的，他們以社會福利和社會改革為主導思想，以傳播基督教教義和救贖中國社會為最終目的。授課的內容主要也是西方社會學理論和西方社會發展狀況，並沒有根植於中國本土的知識內容，因此與當時中國社會的實際脈動有一段距離(閻明 2004)。嚴格說來，社會學由西方傳入中國之初，並沒有在學界引起很大的影響，它濃厚的西方、宗教的色彩甚至引起一些學者的反感

和排斥(Cheng and So 1983)。社會學在中國的長足進展，要等到後來受過專業社會學訓練的學者來開展。

第一代中國社會學者大部分在受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之後，自費或得到獎學金的資助，到當時歐美社會學的重鎮(如英國的倫敦經濟學院、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深造，因而受到比較系統和完整西方社會學專業的訓練，在得了碩士或博士學位後回國，這批學者對自己有很深的期許，他們根據自己在西方所學的知識與方法，扮演溝通東西文化的角色，以社會學作為經世濟民的志業，為富國強民找出路。在他們努力推動下，中國社會學專業在大學的發展、社會學界關注的議題、以及研究的方向，都反映了五四運動前後，一般知識份子經世濟民的熱忱，和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使命感。

從學科建設和發展的角度來說，這批社會學學者當時面臨三個挑戰：第一，怎麼把源自西方的社會理論和方法有效的運用到對中國社會的瞭解；第二，怎麼在中國社會變遷的大潮流中，找到一條富國強民的道路，它既能結合傳統與現代的知識，又能融合東、西方文化的精華；第三，怎麼以中國社會學的研究成果，不僅與國際社會學界對話，並能做出有代表性、根植於中國社會的具體的貢獻。他們到歐美留學的經歷，使得他們嚮往歐美自由主義的思潮，因此，與社會學專業發展齊頭並進的，是他們企圖以循序漸進、全民教育的平和手段，推展自由、民主、及社會進步的救國方案。雖然其中有少數人意識到「書生救國」的侷限性，但是，整體說來，這些歐美歸國的社會學學者，對於以激進的觀點、用階級鬥爭的手段、進行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都採取保留的態度。當然，嚴格的說來，這跟他們個人的家庭背景、成長過程、遊學經歷不無關係。

在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這批社會學學者雖然大多數仍然留在原來的學術崗位，但是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大潮流和

社會主義建國的旗幟下，他們被定位成，為資產階級服務的「資本主義社會學」(Bourgeois Sociology)學者。雖然他們不認為應該把社會主義(socialism)等同於社會學(sociology)、也對於把馬克思的唯物史觀(materialist-Marxism)當成唯一的「科學方法」採取保留態度，更對於以階級鬥爭作為改革社會的唯一手段不敢苟同。但是在1952年大學的社會學系被關閉之後，這一批中國社會學學者的學術生涯，基本上從此畫上句點。取而代之的是一個跟「資產階級社會學」完全不同風貌、內容、和實踐的傳統，這就是一般所說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閻明 2004)。

唯物史觀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在中國

在二十世紀初，社會動盪、強鄰環視的大環境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跟歐美社會學派相似之處，在於它們都企圖對當時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問題提出解答，也朝著為經濟民找出路做努力，它們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者以馬列主義唯物史觀為理論基礎、以階級鬥爭為手段、以政治革命為目的。因此當時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著重點，不是在大學的殿堂裡進行純粹學科式的建設，而是經由對社會問題的認識和理解，直接提出政治革命的實踐方案。因此，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特色，是其強調和重視「論證」與「實踐」之間的辯證關係。L. C. Young用「大眾社會學」(Mass Sociology)一詞強調，社會學在新中國發展出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為全民所有的知識資產」(Young 1974)。劉劍楚(C. C. Lau)則以「非專業的社會調查」(Non-professional Social Research)一詞，形容一個新的社會學傳統(Lau 1974)。

1952年社會學系在各個大學關閉之後，雖然社會學的相關課程以及社會學研究方法的課程全部停止教授，但是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辯證社會學、以階級關係分析社會問題的視角，以及毛澤東所

大力宣導並加以推行的「農村調查研究」卻慢慢融入於大學的一般課程(Cheng and So 1983)。因此，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挑戰，是怎麼樣加入推翻封建制度、抵抗帝國強權、實踐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建設。

在毛澤東的大力宣導之下，「調查研究」不再是社會學學者的專業，就是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基層幹部也應該懂得、更需要進行「調查研究」。在這樣的前提下，不僅各個大學設有「調查工作小組」，在全國各地、各個單位也普遍成立了「調查工作小組」，「搞調查」成了新中國行政體系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而這些調查工作小組所寫成的「調查報告」不僅對各地的社會經濟狀況有具體的報導，這些報告也往往成為社會主義計畫經濟體系下，中共中央擬訂社會經濟發展計畫的參考材料。因此，這種全面參與、行政體系化的知識創造體系，成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檢驗真理」的特定機制。L. C. Young所用的「大眾社會學」一詞，劉劍楚所描述的「非專業的社會調查」，都在於強調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在新中國的特殊風貌。老師與蘇學長在社會學評論一文中，也提到一九六三至一九六五年和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在全國開展的「四史運動」。這個運動全面動員個別家族成員、農村生產大隊、工廠工人或礦工寫家史、村史、社史、廠史(Cheng and So 1983)。

定性研究與毛澤東的「農村調查」

從研究方法而言，「定性研究」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者至今所一再引以為榮的「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研究方法」。毛澤東於一九二〇和一九三〇年代在湘潭、尋烏、興國所做的農村調查，以及由張聞天所帶領的延安工作調查隊的米脂縣楊家溝調查，是眾所周知的「定性研究」的代表作(鄭杭生、李迎生 200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研

究組 2005)。而毛澤東所強調「調查研究」操作和實踐的原則，一直到今天，不僅是馬列主義社會學者一再轉述的調查研究的方法，在中國一般社會學界也是耳熟能詳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方法口訣有「解剖麻雀」，「蹲點」、「三同」、「下馬觀花」等。

「解剖麻雀」這一詞彙所指的是調查研究者在選擇時，只需要對有代表性的「典型」進行瞭解就可以，因為「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只需解剖一隻麻雀（瞭解一個典型）就可以一葉知秋；一般耳熟能詳的「蹲點」一詞，所強調的是調查研究者對社會現象不能「閉門造車」、「想當然耳」地亂下結論，要進駐到一個選定的村、廠或生產大隊，做深入的調查；所謂的「三同」指的是「同吃、同住、同學習（或同勞動）」，它所揭露的是調查研究者在進駐到一個選定的村、廠或生產大隊之後，要藉著與村民、工人同吃、同住、同學習同勞動，與當地成員拉近距離、打成一片，進而深刻地瞭解當地民眾的具體狀況和想法。毛澤東所說的「不要走馬看花，要下馬觀花」，是要求調查研究者的調查工作，要做得深刻、不要蜻蜓點水、敷衍了事。

在談到農村調查研究的傳統與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的關係時，毛澤東於一九三〇年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書中所提出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一九三一年在《關於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中所補充的「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則是馬列主義社會學的承傳中最膾炙人口的名言（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研究組 2005）。這兩個準則一再被馬列主義社會學提出，不僅作為毛澤東重視實地調查和尊重事實真相的表徵，而且是強調社會學知識和研究（「學」）與社會改革（「用」）相互辯證、互以為用的關係。一九四九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馬列主義為理論基礎、以農村調查為研究方法、以階級鬥爭為手段，取得了政權，這更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比資產階級社會學優越的歷史鐵證。

雖然「解剖麻雀」、「蹲點」、「三同」、「下馬觀花」等概念跟西方實地性研究中，田野調查法（Ethnographic Fieldwork）裡的一些實踐原則有雷同之處，「定性研究」也仍然是馬列主義社會學者所宣稱「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研究方法」，但是直到目前為止，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瞭解，除了閱讀一九二〇和一九三〇年代的原始的經典之作（如張聞天的米脂縣楊家溝調查報告、毛澤東的長興調查、尋烏調查、興國調查等）之外，主要是來自於一九七〇年代學者的研究，當時外界對中國瞭解的管道非常有限，學者只能透過官方資料對於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在中國發展的情況做描述。例如，L. C. Young 對五〇年代之後，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在中國的敘述，是根據署名復旦大學、武漢大學調查小組在紅旗雜誌上所刊載的調查報告（Young 1974）所總結出來的。劉創楚對馬列主義社會學的分析和理解，是根據 1968-1970 年間的「調查工作小組」為名義，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所發表的「調查報告」完成的。從方法論的角度看來，這些「調查報告」，雖然可以透露一些馬列主義社會學的內容，或是當成馬列主義社會學的成果，但是從分析這些「調查報告」的內容，我們無從得知，寫成這些報告的機制（production mechanism）。況且，從認識論的角度看來，因為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都是官方刊物，因此在引用這些「調查報告」時，不能不對它的內容、立論基礎，和呈現視角做出進一步的檢視。這些原本因為一手材料不足所受到的限制，近年來因為中國出版環境的相對寬鬆，有了初步的改善。

問題的提出與研究資料

從二〇〇〇年代初期開始，不少回憶錄或對歷史事件追憶的專文在中國和香港出版，這些作品的作者或是當年親臨其事的當事人，或

是當事人的親人、同事，根據當事人的日記、笈記編寫而成。這些回憶錄，為進一步瞭解馬列主義社會學提供了很詳細的具體素材。

我之所以用「昌黎調查」和「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為案例，最關鍵的因素是，當時親自參與社會調查的幾位當事人，以目睹親臨的方式，詳實的記錄了這兩次調查的來龍去脈。不同於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上所刊登的「調查報告」，這些記錄，讓我們走到「調查報告」的幕後，對當年調查工作小組的成員（參與人員的背景、參與的機制）、「調查研究」進行的過程（怎麼選定蹲點的縣、鎮、村、生產大隊，怎麼收集資料，怎麼進行訪談）、「調查研究」的具體目標，和調查報告的完成過程（調查報告是誰寫的、怎麼寫的、完成的初稿，在進入當時的行政體系之後，是如何被解讀的）等議題，有進一步瞭解的可能。

當然，我以這兩次調查為個案，也是因為它們都是在—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進行的，進行調查的重點都是要瞭解當時「公共食堂」在人民公社開辦的情況。這讓我能把這兩次調查，視為瞭解「大躍進時期（1958—1962）【調查研究】的實踐與挑戰」的窗口。

以下，我先對這兩個調查的時代背景做一個簡述，然後再對兩次調查的具體情況，進一步陳述分析。

時代背景和兩個調查案例

在建國初期，中共以馬列共產主義建設新社會的藍圖裡，人民公社以及由人民公社辦的公共食堂是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標竿。—一九五八年起，象徵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已在全國各地紛紛成立，跟農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公共食堂」也一一開辦，而跟農民生計和農村經濟密不可分的平均畝產量也扶搖直上。

—一九五八年五月，在北京召開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會議做出「鼓

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決定，—一九五八年八月底，中共中央，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這項「決議」下達貫徹執行後，人民公社化運動在全國掀起高潮，但也隨之而來引起所謂「高指標、瞎指揮、強迫命令、浮誇風、共產風」的「五風」問題。為了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已出現的問題，身為最高領導的毛澤東，鼓勵在全國範圍內，大舉進行社會調查研究，以瞭解人民公社推展的實際情況。在這幾個月裡，中央對於地方呈交上來，反映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實際問題的調查報告，採取接納甚至鼓勵的態度。—一九五九年七月，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對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提出直接的質疑，因而跟毛澤東發生正面衝突。在此衝突之後，大部分對大躍進提出疑問、對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提出批評意見的人，歸類為「右傾機會主義者」。在此之後，記錄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經營問題的調查報告都被當成「右傾機會主義」的證據，大部分參與實地調查和草擬調查報告的人員都受到批判。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經濟研究所主持下的昌黎調查、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人民公社調查組在河北、河南兩省做的調查，就是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下進行的。

案例之一：昌黎調查

—一九五八年秋，人民公社已在各地成立，隸屬於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經濟研究所的專家和青年學者，組成工作組到河北省昌黎縣農村參加勞動鍛煉並進行對農村基層工作情況的調查研究。昌黎調查組的副組長王紹飛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完成一份題為〈河北省昌黎縣最近公社的工作情況及問題〉的調查材料，這份調查材料對當時人民公社出現的問題提出說明。要整頓嚴重偏軌的人民公社運動，減緩

「共產」風的蔓延，需要強調「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多產多分」的社會主義原則。這個報告呈交中央後，受到中央的贊許，毛澤東看到報告後，批示：「河北省昌黎縣的情況和他們所提出來的意見是有普遍性的。各地各級黨委都應注意解決。越快越好。」毛澤東要求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將此信及附件發給各級黨委，一直到生產隊的支部書記」，並「即送劉、鄧、震林閱，尚昆用電報發去，發後再送周、陳、林、朱閱」。而且把報告轉發給各級黨委，甚至下達到生產隊的支部書記（經君健 2005）。

在五月七日昌黎工作組的階段會議上，工作組長董謙宣佈了工作組第一篇報告受到黨中央的重視，鼓勵組員進一步根據掌握的情況，擴大向中央反映人民公社存在的問題。董謙要求組員及時寫一份針對農村公共食堂問題的報告，他要求四個寫報告的原則：第一要材料可靠，第二要先肯定成績，第三要反映存在問題，提出解決辦法，第四要抓緊時間（董寶瑞 2009）。第二篇名為〈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幾個問題〉的報告，於五月十一日定稿，交給董謙。

不料因為政治風向的轉變，昌黎調查組的第二份調查報告在一九五九年夏天的廬山會議上，受到毛澤東的點名批判。當時毛澤東與彭德懷已經發生衝突，在毛批評彭德懷的發言中，一改幾個月前對批評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所採取的接納立場。現在，毛不但特別肯定了農村公共食堂，說「食堂是個好東西」，「節省物資，包括糧食油鹽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並且在大會上，毛特別批判了昌黎工作組的第二篇〈食堂報告〉，說「有個右派出來了；一個科學院調查組，到河北昌黎縣，講得食堂一塌糊塗，沒有一點好處，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學那個宋玉的辦法，寫『登徒子好色賦』」。³

3 引自李銳，1999，〈毛澤東7月23日的講話〉，《廬山會議實錄》，頁135-136。

一九五九年九月，廬山會議後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全國發起「反右傾」運動。昌黎工作組的第二篇報告成為被批判的重點，董謙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這個名為「反右傾」的政治運動持續了兩年之久。

一九六一年，中共中央通過《農村六十條》，允許農民自己決定辦不辦食堂，六月十九日發出《關於堅決糾正一平二調錯誤、徹底退賠的規定》，農村公共食堂才得解散。當年因參與昌黎調查而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的調查組成員，一直到許多年之後才「戴帽子」，得到平反（經君健 2005；董寶瑞 2009）。

案例之二：兩校人民公社調查

「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組」是由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兩校黨委組織成立的。調查組的成員由兩校的法律、政治、經濟、財貿、哲學等系的領導、中青年教師，研究生和高年級大學生組成，還有一個蘇聯留學生和兩個越南留學生，共162人。調查組的主旨是要「對人民公社化運動進行全面的系統的調查，目的是為學校的教學科研服務，要求寫出調查報告、論文，向國慶十周年獻禮」（李震中 2009）。「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組」於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初分為三隊，分別出發到河南省信陽縣、魯山縣，和河北省高城縣的人民公社進行實地調查。

三個調查組在河南信陽、魯山、河北高城等三縣，進行了為期半年的調查研究。一九五九年五月調查結束，人員返京後集中在北京大學，繼續做好後期工作：撰寫調查報告、討論研究重點問題、寫出論文。七月調查組的工作順利結束（劉武生 2006；李震中 2009）。雖然「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組」所完成的調查報告的原件目前仍然沒有公佈，但是從調查組完成調查報告之後一個月之後所發生的一系列事

伴，很清楚的顯示，「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組」的調查報告成了後來政治風暴的「素材」，籌組調查組的行政人員和參與實地調查的當事人也被波及。

一九五九年八月，也就是調查組完成調查報告之後的一個月，廬山會議之後，所有對人民公社質疑的言論都被認定為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組」的相關材料，順理成章地變成北京市委貫徹中央反右傾政治鬥爭刀組下的魚肉，隨之而來的是一場長達兩年的風暴，組織調查組的行政領導和實際參與調查的相關人員，理所當然的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成員。

調查組的總領導人、當初在調查組出發前的動員大會上致辭講話的北大副校長鄒魯風，自殺身亡。參與調查人員則受到一種「對敵鬥爭方式、審判式的鬥爭」。在批判會上鬥爭的謾罵，包括對當事人尖酸刻薄的人格侮辱（如「沒有出息」、「沒有良心」、「喪心病狂」），在經過黨委審定過的批判稿子裡，則寫滿了聳人聽聞、給當事人扣的政治大帽子（如「反對、否定、攻擊、詆毀、污蔑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批判後，有九個調查組成員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十一個成員被定為「嚴重右傾」。有些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另有一些受到嚴重警告或降兩級工資的處分，也有的開除黨籍或取消預備黨員的資格（李震中 2009）。

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下，人民大學黨委命令全體人大調查組的成員重新回到原調查地點，重新調查「人民公社的優越性」。李震中認為，雖然黨委宣稱這次調查是根據「在哪犯的錯誤在哪改正」的精神，其實這也是一個「名為調查，實為勞動改造」的舉動。一九五九年底六〇年初，在大躍進的中央政策下，信陽經歷了嚴重的饑荒，⁴ 調查組成員

4 信陽地區位於河南省東南，是河南重要的稻產區，也以「魚米之鄉」著稱。近年學者估計，信陽地區在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〇春，有八分之一（100萬）的人口餓死。楊繼

雖然親眼目睹了農民被活活餓死的慘狀，自己也遭到挨餓、吃樹根、腳浮腫的折磨，但是在調查報告裡寫的，卻是對人民公社優越性的肯定，以及對公共食堂的歌頌，沒有任何人敢把耳聞目睹的實況寫進調查報告裡（李震中 2009）。

直到一九六一年，中央承認由大躍進引起的大饑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從而認定，一九五九年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組的調查報告中所提出的批評意見是對的。在中央的政治方針改變之後，北京市委才做出裁定，確認兩年前對「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組」批判是錯誤的，指示北大和人大黨委對調查組甄別平反，當年受到批判或處分的調查組成員，一直要到多年之後才分別得到平反，恢復了名譽。

以上的陳述，是根據幾位調查組成員的回憶所完成的「重現」。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看到文中所提到的三份調查報告，但是根據幾位調查組成員的敘述，我得以從研究方法的視角，進一步「重現」當年調查研究進行的相關細節。這些細節不僅對單單以「調查報告」為資料來瞭解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有所補充，也對毛澤東於一九二〇和一九三〇年藉農村調查所開創出來的「定性研究」的傳統，打開了一扇深入探索的視窗。

從研究方法的視角分析兩個調查案例

為了能進一步瞭解當年進行「調查研究」的細節與調查人員所面臨的挑戰，以下，我從兩個角度進一步分析「昌黎調查」和「兩校人民公社調查」兩個案例。第一，我把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當成在新中國剛剛萌

腳 2008，《墓碑：中國大饑荒紀實（1958-1962）》，Tombstone: Collections on China's Great Famine (1958-1962)。香港，香港天地圖書。Dikotter, F. 2010. *Mao's Great Famine: The 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New York: Walker Co.

芽的一門專業學科來看待，以抽絲剝繭的方式，探討這個專業學門成員的背景，以及【調查報告】寫作的機制，以便瞭解這個學門與政治社會體制之間的關係。第二，我從方法論和認識論的視角，遵守西方社會學科質性研究方法中的歸納邏輯(inductive logic)，以及質性研究強調知識的「建構」(constructive)過程及「詮釋」(interpretative)性質，探討「定性研究」的具體實踐。整個說來，我從四個主題來探討中國大躍進期間「調查研究」的實踐與挑戰：調查成員的背景、調查工作小組的安排、調查研究的主旨，和調查報告的「製造」過程和機制。對於每一個主題，取決於原始資料是否存在，我用一個或兩個案例檢視。

調查組成員的背景

一九五二年關閉大學裡代表資產階級的社會學之後，到底什麼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怎麼實踐馬克思主義社會學、什麼樣的調查研究是遵循或違背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這些問題其實沒有(或許也不可能會有)說一不二的定論。對於參與調查的研究者本身而言，他們在展開以馬克思主義為主導思想的調查研究工作的同時，自己也受到新中國諸多政治運動的洗煉衝擊。這些政治運動所代表的，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這一專業學門所處的政治環境，也是新中國建立初期，個人與政治體制之間不易掌握的緊張關係。「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組」成員之一汪子嵩的經歷，很有說明性。

汪子嵩原本是北大哲學系副主任和辯證唯物主義教研室主任，後來在哲學專業與無產階級政治掛帥關係的論證中被認定為「右傾」而放到農村去勞改(汪子嵩 2005)。他對個人參加一九五九年調查研究的心路歷程有細緻的描述。在他的回憶中，他個人對馬克思主義為主導思想的領悟，是透過當時的政治大環境下，風起雲湧的政治運動和

不斷的勞動改造過程，逐步轉變而來的。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主要是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號召群眾幫助黨整風，當時北大的黨委書記兼第一副校長江隆基堅持實事求是，在第一波的反右運動中，在劃定右派分子的問題上，掌握「必須分清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區別，這與當時北大的上級領導的認定不同(他們認為「北大是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池深王八多！」，怎麼在教授中只打出這麼幾個右派?)，進而認定這是因為江隆基本人「右傾」的結果，從而撤銷了江的職務，並派來一位新的黨委書記，在北京大學重新掀起一場猛烈的反右運動，被打為「右派」的人數和比率迅速擴大。缺乏社會經驗的青年學生僅僅因為說錯一句話，也被補劃為「右派」，全校「右派」達七八百人。

汪子嵩當時是北大黨委委員，行政上是哲學系副主任和辯證唯物主義教研室主任，在北大第二波反右運動的大、小鳴放會上，他往往是主持人或旁聽者，雖然對群眾有些尖銳的批評，心裡還感到有點委屈，但他堅守聽取群眾的批評意見，不發表自己看法的原則。但是在討論教研室幾年年輕教師是否劃為「右派」時，他發表了意見，他認為這些青年教師只是對某些幹部提出批評，「並沒有反對黨的方針政策，怎麼能劃為『右派』呢？」因為他公開表達了他的立場，最後在宣佈把這些青年教師定為「右派」的支部會上，汪就被要求檢討他自己的「右傾思想」。一九五八年底，汪被點名參加第一批幹部下鄉勞動鍛煉的行列。在北京門頭溝區齊堂清水參加農業勞動，兩個月後，又被召回參加「紅專辯論」，成為批鬥的對象。這是因為兩年前，他提出對哲學系學生的學習方向和哲學系發展規劃的意見，這時候都被拿出來當做「只專不紅」或是反對馬克思主義指導的鐵證。⁵

5 據汪子嵩自訴：「紅」就是政治，「專」是指業務；在二者的關係中，政治是「虛」，業務是「實」，但政治是精神，是靈魂，是統帥，必須是以虛帶實，紅統帥專，政治統帥業務；

那年暑假，哲學系奉命全系下放到北京大興黃莊蘆城鄉，實行開門辦學，領導交代哲學系下鄉的任務是開門辦學，一面勞動一面教學。汪以為這些知識份子的任務是參加勞動，同時對農民開展教學，因此，他對北京市委來視察哲學系工作的領導彙報工作時，提出如何對農民進行教學這一議題，不料，受到了領導狠狠地批評，「下鄉向農民學習勞動，就是最好的學習」。原來，所謂開門辦學不是要對農民開展教學，而是要學校敞開校門，把知識份子送出學校大門，向農民大眾學習。這樣的當頭棒喝，讓汪對自己感到非常氣餒，他認為自己「白專思想」大概是一輩子改不掉了，因而，當他聽說成立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組時，汪便積極報名參加，希望借著參加調查小組的工作，自己能有機會跟得上時局的變化(汪子嵩 2005)。

由調查的參與者的回憶看來，雖然他們當時不見得沒有意識到參與實地調查的「政治性風險」，但是書生報國的志向以及對新生事務的政治熱忱卻是不容否定的。也就是說，當年深入農村做調查，其實有嚴肅的一面，參與者確實希望藉著深入調查為實質性的議題找答案。當時不僅迫切需要瞭解農業產量、農民收入、農民生活、財貿和治安狀況等具體情況(劉武生 2006)，因為當時學界對如何從社會主義

如果不由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而由資產階級政治掛帥，便是「白專道路」。他當年要哲學系學生在學馬克思主義哲學之外，根據自己的愛好，選擇一門其他科學，如社會科學的經濟、歷史或自然科學的數學、物理、生物等，學習它的一些基礎課程，和抽象原理的哲學結合起來，才有具體內容，在「紅專辯論」上，便成為「只專不紅」的典型。汪表示，「當時的北大哲學系是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時將全國各大學原有的哲學系教授集中起來進行學習改造，其中許多是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和邏輯學的知名學者，我們長期不知如何發揮他們的專長。在討論哲學系發展規劃時，我提出：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方面，我們的力量無論如何總不如中央黨校和中國人民大學，是不是可以考慮將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和邏輯學定為北大哲學系發展的重點。現在將這條意見揭發出來，便成為『反對馬克思主義指導』的鐵證。揭發批判我的大字報貼滿了哲學樓，我幾次在全系大會上檢討自己的資產階級白專道路。」(汪子嵩，2005，〈一九五九年「反右傾」運動中的一件個案〉，《縱橫》，11)。

過渡到共產主義、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在共產主義經濟體制下可否取消，以及如何消滅等問題，有不同的立場，農村調查的參與者也希望能補助實地調查，化解爭議(汪子嵩 2005)。汪子嵩的回憶裡提到，後來自殺以明志的北大黨委副書記、副校長鄒魯風和實地調查的參與者對所見所聞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其實有很深的憂國憂民的情懷(汪子嵩 2005)。

調查研究的主旨和其機制化

進行調查研究的主旨，也跟探討如何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原則為指導，來建設新中國有關。當年參加工作組的經君建，對中國科學院經濟所在昌黎進行實地調查的主旨，有如下說明：

經濟所為了探索社會科學為現實經濟服務的道路，提高經濟學研究水準，通過理論與實際密切結合，積累第一手的資料和工作經驗，經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和中宣部批准，派出一個工作組，比較長期地入駐農村，這是改進經濟研究工作的一次試驗，所以該組也被稱作經濟研究工作的「試驗田」(經君建 2005，頁58)。

兩校人民公社調查工作的政治使命可以從劉武生和李震中所述的，出發前的隆重動員大會看出端倪。他們指出，出發之前，兩校的黨委特別召開了隆重的動員大會，北大、人大黨委書記、副校長和人大黨委副書記、副校長等都出席了這個動員大會。在動員大會上，人大原副校長、剛調往北大任副校長、並分管指導兩校調查組工作的鄒魯風代表兩校黨委還發表了特別的講話。鄒指出，這次深入到農村人民公社調查，既不可犯毛所批評「走馬看花」、不明就裡的錯誤，也不

僅僅是一般「下馬看花」、點到為止的敷衍，而是要遵守毛所一再強調長期蹲點的「三同」原則：一面參加當地的具體工作，一面和公社社員同住、同吃、同勞動，從而進行調查研究，以掌握「第一手情況」。因此，從方法論而言，這次實地調查是符合毛澤東二〇年代三〇年代進行農村調查後所總結出來的「調查研究」的實踐原則的。

因此，大躍進期間「調查研究」的挑戰之一，其實不在於參與調查者對農村實際情況的不瞭解，而在於當時有沒有「政治」空間，陳述這些實際情況。因為這次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組」的指導思想和中心任務是要在「參加實際工作和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從理論上總結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優越性」（劉武生 2006）。也就說，實地調查必須要達到為社會主義背書的既定目標。更值得注意的是，鄒魯風的講話，還勾勒出，在新中國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過程中，知識份子跟國家的關係，鄒魯風認為，在新中國建設的過程中，會出現很多新生事務，在大學任教的教師和學習的學生，要以人民公社這類新生事物為研究的素材，作為社會科學尤其是科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哲學等學科研究的物件和課題。因此，昌黎調查和兩校人民公社調查這兩個案例所呈現的，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在新中國體制化的一面（institutionalization or bureaucratization of Marxist Sociology）。這從調查組工作的具體安排，特別可以看得出來。

總體說來，調查工作組的成立、參與成員和調查地點的選定，以及調查的主旨都是經過學院和黨的黨政領導體系磋商之後，層層核准的。例如，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主導的「昌黎調查工作組」的成立是經過研究所直屬上級單位，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和中共中央宣傳部共同批准的，並選定調查地點為離北京不算太遠的河北省昌黎縣，就經濟研究所而言，調查工作組的研究工作是經濟研究所的「試驗田」，中宣部科學處則視工作組為其基層農村工作的「氣象站」，期望工

作組能及時的向上級反映農村政策執行的情況（經君健 2005；董寶瑞 2009）。

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組每組設大組長一人，副組長二人，由兩校系級幹部擔任。調查組到調查的縣份後，調查組的領導組織機制與當地原有的行政機制結合，以便更順利的進行調查工作。例如，河南商城縣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組的大組長是人大法律系黨總支書記韓銘立，副組長是人大財政系主任方曉丘和北大哲學系副主任汪子嵩。到了河南商城縣後，韓銘立兼任縣委副書記，方曉丘、汪子嵩分別擔任縣委財貿辦、縣委宣傳部的領導職務。調查組選定調查的公社後，調查小組進駐公社，調查小組的組長可以列席公社黨委會（劉武生 2006）。

調查報告寫作的過程與機制

從這些調查組和當地行政體制結合的安排看來，調查工作小組其實是一個「局外人」（outsider），要瞭解農村狀況，必須要與地方行政體系打交道。大躍進時期，為了逢迎中央的政策方針或上級的指示，行政機構上下層層相扣，集體造假或隱上瞞下的風氣已經很普遍，調查研究小組要瞭解事實真相，面對的挑戰，除了前面所提的，有沒有據實向上級報導的政治空間之外，另一個挑戰是，怎麼跟一個編造材料、隱瞞事實真相的行政體系打交道。汪子嵩就提到了他與一個編造出來的「事實真相」下期而遇的經歷。

當時，為了競相成為農業生產的「先進縣」，各級幹部不惜捏造高產資料、甚至拼湊照片，以便滿足中央要求，營造大躍進農業增產、工業起飛的假相。汪子嵩跟「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組」主持商城調查工作的組長韓銘立，到商城安排調查工作小組相關的事宜時，順道參觀了商城的「大躍進成績展覽館」。在館裡，他看到了一張「比梯子還大的

大白薯」的照片，汪子嵩是這麼敘述這次解垢的：

「搞城」地處京漢路石家莊市西邊的河北省中部大平原，滹沱河穿過其中，這片肥沃的土地是河北省主要的小麥和棉花產地。搞城當年小麥畝產據報已高達兩三千斤，是河北省著名的先進縣。我們先參觀了「大躍進成績展覽館」，裡面陳列了各種高產數位、表格和各種產品實物，看了實在令人鼓舞。但是我們看到展覽中有一張照片：中間是一個碩大無比的白薯，旁邊倚著一張梯子，一個人站在梯子上還不到這個白薯的一半高。我不由得感到驚奇，便問真有這麼大的白薯嗎？陪同我們的人笑著說：這是照相館拼起來的。我們在心裡打了問號。韓銘立同志是富有實踐經驗、參加過多次運動的老幹部，他以後再三交代調查組員：我們的調查工作必須實事求是，但在對縣委幹部接觸時，說話必須十分謹慎小心（汪子嵩 2005）。

汪子嵩短短的一段敘述，對我們探究大躍進時期調查研究的實踐與挑戰，提供了很具備說明性的訊息。首先，「比梯子還大的大白薯」的合成照片，是當時五風之一「浮誇風」的典型。在集體造假、上行下效這樣的風氣下，身為局外人的調查工作小組，怎麼探得事實真相，是一個不小的挑戰。其次，汪子嵩提到組長韓銘立對調查組員再三交代的是兩個不容易協調的原則：一個是調查工作組做調查是要遵守「實事求是」的研究原則，另一個是跟縣委幹部接觸說話時要「謹慎小心」的處事原則。這兩個對比凸顯了「認知」(knowing) 與「表述」(presenting) 之間的落差。調查組不僅僅在搜集資料時，要面對和處理這兩個落差，在後來寫調查報告時，仍然要面對並處理這兩個落差所帶來的挑戰。第三，汪子嵩認為，韓銘立對「認知」與「表述」之間這

落差的理解和處理方式，來自於他豐富的「實事求是」和「參加過多次運動」老幹部的閱歷。他對調查組成員「實事求是」和「謹慎小心」的再三交代，是他處理這個落差的應對策略，這樣的應對策略，一方面顯示了韓銘立對追求認知時「實事求是」原則的堅持與期許，另一方面也顯示了學術界「實事求是」的追求與行政體系「展現社會主義成果」壓力之間的緊張關係。這個緊張關係是在當時政治大環境下，即便在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學者也要面臨的挑戰，也是有閱歷的領導人要承擔的政治風險。由後來昌黎調查和兩校人民公社調查捲入反右傾的政治風暴的事端看來，即便是在「實踐經驗」並「參加過多次運動」老幹部的領導下，一再戰戰兢兢、戒慎恐懼的處理進行調查研究所面臨的挑戰，有時也不能免於遭受政治批鬥、甚至喪失生命的不幸遭遇。

仔細追究，調查工作小組所寫成的調查報告，其實有具體的機制來處理從「認知」到「表述」的過程。董寶瑞「昌黎調查報告問世前後」一文，對這個機制和過程有詳細的記載。根據他的記載，當時調查報告的書寫是集體完成的，昌黎調查的第二篇報告，〈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幾個問題〉，是根據調查工作組搜集的資料，由經君健和另一個工作組成員分別起草而成，他們根據調查組所收集的資料，對食堂佔用強勞動力的問題和農村公共食堂開辦不利養豬積肥、浪費燃料，以及房屋和傢俱平調等問題，寫成初稿，初稿完成後再由經君健統稿。統過的稿交給昌黎工作組的組長董謙過目，董謙認為，初稿對(1)農村公共食堂與公社社員生活集體化的關係；(2)農村公共食堂管理水準等這兩個問題寫得過於簡單，需要做適當的補充，為了補充這兩方面的材料，經君健和工作組成員回到蹲點的大隊，以座談會的方式，調查與核實農村公共食堂存在的問題，然後重新修改補充完成調查報告的定稿（董寶瑞 2009）。

初稿修改完成後，由董謙把名為〈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幾個問題〉

的定稿帶回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並在經研所特別召開了擴大會議，公開的討論了這篇調查報告，據董寶瑞所記，當時董謙還特別：

邀請中共中央宣傳部科學處和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負責同志參加，一同認真討論了這篇關於農村食堂問題的調查報告。會議沒有提出原則性的不同意見的前提下，決定由董謙將〈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幾個問題〉調查報告送交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以及河北省委、唐山地委、昌黎縣委等各級黨組織主要領導研究、參考。不久，〈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幾個問題〉被中共中央宣傳部主辦的內部刊物《宣教動態》刊登，「作者」署名為「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河北昌黎縣工作组」（董寶瑞2009）。

農村食堂究竟有無優越性

這篇原名為〈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幾個問題〉的調查報告，在《宣教動態》上刊出時，並不是以原來的題目刊出，而是以〈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幾個問題〉為題刊出的。董寶瑞、經君健在回憶昌黎報告寫作經歷時，都認為新的標題，激化了原本「中性」的調查報告，董寶瑞更詳細的條列了原來定稿的分節小標題，以及後來刊登出來，經過修改後的分節小標題，目的在對照前後兩者的區別：

分節小標題〈食堂與婦女勞動力的解放〉被改成〈食堂化並沒有解放婦女勞動力〉，〈食堂與糧食問題〉被改成〈浪費糧食〉，〈食堂與肥料〉被改成〈影響社員不能養豬積肥〉，〈食堂與燃料〉被改成〈燃料緊張〉，〈食堂的房屋設備〉被改成〈佔用房屋增加社員負擔〉，〈食堂與生活集體化〉被改成〈只有大集體，得不到小自由〉，〈食堂與管理水準〉被改成〈缺乏管理食堂經驗〉。從文章標題和分節

小標題所作的較大改動看，《宣教動態》的編輯去掉了調查報告標題的「中性化」味道，突出了問題提出的「尖銳化」色彩（董寶瑞2009）。

他們認為昌黎調查的報告之所以後來引起政治上的軒然大波，關鍵在於調查報告原來的定稿和後來在《宣教動態》刊出的稿件之間，出現了一個「激化」的過程。所謂的「激化」指的是，昌黎報告的名稱由原來「中性」的名稱（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幾個問題），被改換成懷疑公共食堂優越性的名稱（農村食堂究竟有無優越性），而且原來的描述性的小標題也被替換成針對問題、立場鮮明的小標題。

「昌黎調查」所引起的政治風暴是不是因為調查報告不是以原稿，而是以修改過的名稱和小標題在《宣教動態》上刊出，值得商榷。因為，同一個時期，「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組」所寫的調查報告，並沒有經過文字內容上的修改過程，「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組」也因為對當時人民公社遇到的具體問題做了總結，所寫出來的調查報告後來也在「反右傾」的政治運動中成了反革命路線的證據，調查組的參與成員因而也受到政治批判。

其實，從調查報告撰寫的機制和過程而言，另外有三個頗耐人尋味的問題。(1)為什麼在報告寫作之初特別採取了「中性」的表述，昌黎調查小組當時選擇這樣表述方式的考慮是什麼；(2)《宣教動態》的編輯又是在什麼樣考慮下，決定以立場鮮明的文字取代原本「中性」的文字；(3)《宣教動態》的編輯改稿的權利是怎麼來的，在後來「反右傾」運動中，有沒有受到波及，如果沒有，原因何在，為什麼受到波及和政治批判的是當初收集材料、撰寫調查報告的調查組成員。

「調查研究」的實踐與挑戰

大躍進時期參與「昌黎調查」和「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的成員，回憶起當年的經歷，大多心有餘悸。近年來學者也試著對大躍進時期「調查研究」的實踐和挑戰，提出評語論斷。一般認為，由調查研究所引起的軒然大波，是因為當時政治勢力不正常的進入學術圈子，扼殺了學術界探討真理的空間，打擊了學術界事實求是的精神。李震中就持這個立場：

人民公社調查組既不是決策機構，也不是行政部門。而是一群書生對公社化運動進行調查，關起門來研究一些問題，不求別的，只求理解。即使研討的一些問題、發表的一些見解非常幼稚甚至不合時宜，也無關緊要。況且經過實際調查提出了一些值得研討的問題。這些問題即使在當時也有理論意義和實際意義。就以「內部參考」所列的那些問題來說有許多是值得研討的，需要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加以闡明。作為高等學校，師生們研討一些實踐中提出的問題，本是正常的學術活動，應該提倡和鼓勵。事實上，人民公社調查組在一九五九年五月返京以後，學校黨委還是這樣做的。當時研討問題，大家能夠暢所欲言，各抒己見，沒有出現亂扣帽子的現象，都是以理服人，樹立了比較良好的學術風氣。可是「反右傾」一來，學術風氣一掃而光，驟然變成一場政治風波。正常的學術活動，一夜之間變成反對人民公社的政治事件。這樣一來，不僅毀掉了調查研究的可貴成果，而且還打擊了事實求是的精神。這是高等院校中混淆學術與政治的典型事例。歷史經驗：在學術領域應當鼓勵創新精神，鼓勵言之成理，持之有據的新見解、新觀點。這不僅有利於發展學術，而且也是培養創新的

人才的基本條件（李震中 2009）。

這種把「政治」和「學術」視為兩個不同的領域，強調身在學術領域的學者，應該有言論自由，因而對其言論或研究成果應該享有政治的赦免權。這固然是一個值得尊重的立論，但是這個立論忽略了五四運動以來，社會學學者走出學術象牙塔的意願，他們或者以行動實際參與社會改革，或者以其所學，對當局者出言納策。在這樣的歷史潮流下，堅持認定「政治」和「學術」應該是兩個互不往來的領域，這跟當時的時代背景相違背，而且也沒有全面的展現「政治」和「學術」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由此討論引發的議題是，在知識份子有興趣、熱忱，也覺得有責任和義務報效國家的前提下，應該建立什麼樣的機制來確保知識份子有足夠的「安全空間」能捍衛「知識」的尊嚴，堅持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操守。在什麼樣的氛圍裡，知識份子才不至於竊位素餐，濫用知識，甘為買辦，為國家或其他的權勢團體作嫁、背書。

從方法論和認識論的視角來看，「昌黎調查」與「兩校人民公社調查」這兩個案例所代表的，是一個以政治理論掛帥，抹殺報導實際社會現象空間的案例。這牽涉到新中國成立之初，怎樣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的共產社會的問題。從理論上而言，馬克思理論指明，在資本主義體制進入共產主義之前，有一個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但是在中國革命實踐的過程中，在推翻了資產階級社會之後，向無產階級社會邁進，並沒有具體的步驟或成規。當時，在理論與實踐關係的爭辯的過程中，有兩派立場，毛澤東主張的是跨越「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階段，直接、並且立刻進入「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理想社會，中共中央在全國推動「人民公社」，所遵從的就是這個理念。但是，當時另有經濟學家，認為「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階段是一個不能忽視、跨越的階段，只有等到社會產品豐富、人民覺悟提高之後，

才能進入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理想社會。持這一認知的，對於立刻取消資產階級法權，取消薪金制，甚至取消商品和貨幣，跨越商品生產、按勞分配，直接進入共產主義，採取懷疑的立場。「昌黎調查」和「兩校人民公社調查」所瞭解到的實況，其實是中央政策堅持跨越社會主義階段，直接進入「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理想社會所遇到的具體問題和阻力。

據汪子嵩的瞭解，當時主持「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的北大副校長鄒魯風，他是不贊成跨越社會主義階段，直接進入無產階級社會的。因此，他認為應當以調查研究所發現的事實真相來指導政策的方向，不應當「理論先行」、否認事實（汪子嵩 2005）。從這個角度看來，鄒魯風後來自殺的象徵意義，可以說是對以理論為主導，否認社會實際事實的不苟同。整體說來，大躍進時期所進行的「調查研究」，是根據著定量研究的演繹邏輯（deductive logic），而不是遵守著質性研究的歸納邏輯（inductive logic）。從這個角度看來，大躍進所引起的大饑荒，應算是毛澤東一再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反調。

從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在新中國的發展而言，「昌黎調查」與「兩校人民公社調查」這兩個案例所牽涉到的，應該是老師與蘇學長《社會學評論》之文結語裡所提的問題：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能不能對現有或未來將會出現的社會問題提出有效的解答？如果不能，怎麼辦？如果他所提的答案不為當權者所認同，那會怎麼樣？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會是一個改造人類命運的學科，或是僅僅是統治者維護其權勢的工具？

討論——「學」與「用」的辯證

以參加大躍進時期「調查研究」當事人的回憶為史料，本文企圖探討資產階級社會學廢除之後，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我以

「昌黎調查」與「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為案例，來探討大躍進時期「調查研究」的實踐與挑戰，經由對調查研究具體的進行情況的分析，瞭解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與當時國家機器的關係。

從方法論和認識論的角度看來，大躍進時期「調查研究」不再是、也不僅是一個「學術」活動，而且也是一個「政治」活動。在以馬列主義為新中國建設的最高指導原則的建國過程中，「調查研究」的主旨、大方向是由黨的體系指導擬訂的。雖然調查者很多仍以「下馬看花」聽點的方式進行社會調查，但是，農村調查研究者對社會現象民生疾苦的瞭解是一回事，這些根據長時間蹲點所總結出來的「認知」，以及後來寫成的調查研究報告，先要經過內部同儕的協議，再要經過主管上級的審核，然後才會呈交到政策制定的體系。這些經過重重審核後出台的調查報告，從此變成政策決定甚至政治鬥爭的「素材」，這些素材後來會以什麼面貌呈現為政策，甚至會怎樣被用來當成政治鬥爭時批鬥的「證據」，還有一個重要的「詮釋」環節，在「詮釋」這個環節上，詮釋的「視角」和詮釋的機制非常關鍵，政治風向大環境的走勢很大程度決定了詮釋的「視角」，詮釋的「機制」則取決於政黨內部的運作和政治派系的傾軋。因此，調查報告寫成之後，往往被「詮釋」得面目全非。當初參與社會調查和寫成調查報告的研究者，不但對詮釋的視角沒有置評的可能，對詮釋的「機制」更沒有左右的餘地，他們反而常因為調查報告被認為不符合特定的政治風向，或是因為調查報告被某一個政治派系拿來當成政爭的工具而惹禍上身。

後記

如我在本文引言所說，本文所分析「昌黎調查」和「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的兩個案例，是我對「質性研究在中國的發展與挑戰」研究的一

小部分。由這個開端，引發出更多的議題。因此，對這兩個案例的初步分析，需要放在一個比較大的氛圍來理解。例如，雖然這兩個案例的參與者不是專業的社會學者，但是都是中國科學院、北京大學、人民大學的社會學科相關領域的知識份子，他們有相關學科的基本訓練，因此，他們跟在工廠由工人所組成的工廠調查小組，或是在農村由農民所組成的農村生產大隊調查小組，不僅成員出身背景、知識素養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他們以「外來者」的身份進行調查研究，跟工廠或是農村生產大隊調查小組對本廠、本大隊的調查，可能有不同。因此，我需要進一步有系統的收集比較各類資料，以便對相關議題，有進一步比較全面的理解。

其二，老師和蘇學長文章結語裡所提的問題，跟近年來美國和加拿大社會學界所討論的「學」與「用」的議題，相互呼應。後者所關注的議題有四：如何確保社會學作為一門專業學科所以必須遵守的專業水準；如何確保社會學的批判視角；如何避免社會學被國家或是任何其他權勢、體制壟斷控制；如何確保社會學者及他／她們不僅僅在象牙塔裏閉門造車，他／她們所關注的議題，所創造的知識內涵，也必須與象牙塔之外的社會大眾的脈動息息相關（Cormier 2002; Burawoy 2004; Burawoy 2005; Burawoy 2009）。因此，不論在亞洲還是在北美，作為一門專業學科，社會學與國家的命脈既是密不可分，它獨立的學術尊嚴更需要體制的保障和知識份子謹慎的捍衛。

從方法論和認識論的角度來看，「定性研究」的傳統確實是中國歷史、政治時空下特定的產物，它雖然與西方傳統的「質性研究」表面上似乎有雷同之處，但在實質上卻不能混為一談。多年來在北美、歐洲學術重鎮之外的北歐、中南美和亞洲學者已具體、有意識的對以北美、歐洲學術的霸權地位提出批判。在質性研究這一領域呈現在，北美的教科書、研究案例普遍被翻譯，因而氾濫於「邊緣」地區的書肆、

課堂，這不僅不利而且扼殺了本土知識的生產和積累（Alasuurtari 2004; Hsiung 2009）。針對質性研究而言，學者們不僅要從事本土化的積累和反思，還需要梳理歷史政治環境下所遺留下來的資產和負擔。從這個角度看來，「昌黎調查」和「兩校人民公社調查」這兩個案例提供了很珍貴的本土素材，可以對質性研究在中國的實踐和推展發揮具體、實質的貢獻。在臺灣，質性研究的課程、教材、和相關研究，有不同的脈絡，不僅反思和本土化這兩方面有拓展、深化的空間，批判的視角也需要全力的經營維護。

總之，這篇追念老師風範與志業的文章，表達的既是我個人對老師的思念，也是對老師追求「批判視角」的呼應，更是為這本薪火相傳的紀念集，加一把柴火。

熊秉純，2011年元月

參考書目

- Alasuurtari, P. 2004. "The Globalization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C. Seale, G. Gobo, F. E. Bhribrian and D. Silverman (eds.), *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 Pp. 595-608.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Inc.
- Burawoy, M. 2004. "Public Sociologies: Contradictions, Dilemmas and Possibilities." *Social Forces* 82(4): 1603-18.
- Burawoy, M. 2005. "2004 ASA Presidential Address: For Public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0(1): 4-28.
- Burawoy, M. 2009. "Disciplinary Mosaic: The Case of Canadian sociology."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4(3): 869-86.
- Cheng, L. and A. So. 1983. "The Reestablishment of Sociology in the PRC: Toward the Sinification of Marxia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9: 471-98.
- Cormier, J. J. 2002. "Nationalism, Activism, and the Canadian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Community, 1967-1985."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33(1): 12-26.
- Hsiung, P.-C. 1999. "Transformation, Subversion, and Feminist Activism: Report on the

- Workshops of a Development Project, Xian, China."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31(3): 47-51.
- Hsiung, P.-C. 2009.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Maoist China and Beyond."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Canadi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Ottawa, Canada.
- Young, L. C. 1974. "Mass Sociology: the Chinese Style."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9: 117-25.
- Lau, C. C. 1974. Non-professional Social Research in Communist China: 1968-1970. Hong Kong: Social Research Centr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Wong, Siu-lun. 1979. *Sociology and Soci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London, Boston and Henley: Routledge Kegan Paul.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研究組，2005，《尋烏調查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起步》，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 劉武生，2006，〈一樁不堪回首的往事——參加人大、北大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組的回憶〉，《縱橫》，(03)。
- 李銳，1999，《廬山會議實錄》，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 李震中，2009，〈鄒魯風調查人民公社之禍〉，《炎黃春秋》，(07)。
- 汪子嵩，2005，〈1959年右傾運動中的一件個案〉，《縱橫》，(11)。
- 經君健，2005，〈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幾個問題的寫作經過〉，《縱橫》，(05)。
- 董寶鼎，2009，〈昌黎農村食堂調查報告問世前後〉，《文史精華》，(07)。
- 鄭航生、李迎生，2000，《中國社會學史新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閔明，2004，《一門學科與一個時代：社會學在中國》，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 熊秉純，2001，〈質性研究方法錫議：來自社會性別視角的探索〉，《社會學研究》，第5期，頁17-33。